

编者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18日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中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世界各国宗教界也共克时艰，同心抗疫，有鉴于此，本刊特别组织了3篇文章，以饗读者。

后疫情时代的宗教公共性问题^{*}

——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五大危害公共安全的宗教聚集事件

黄海波

宗教在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中曾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时，宗教也受到瘟疫的塑造。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以及公共卫生与疾控体系的建立完善，宗教在这方面的直接作用已淡化。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各国宗教界大多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但也出现了诸如韩国“新天地教会”、法国“基督教开门教会”、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东正教圣餐礼仪、印度伊斯兰教宣教团体等数个宗教聚集而引发病毒扩散的事件，这些事件强化了后疫情时代宗教公共性问题的紧迫性。

关键词：争议事件 后疫情时代 宗教 公共性

作者 黄海波，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9-2020年岁末年初，一场对世界而言堪称“黑天鹅”的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正在极大地改变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走向，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规模、破坏力及其后果来看，这场疫情足以同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相提并论。这些让人色变胆丧的病疫大流行有着各不相同的生物学-病理学起因与特点，但对生命的摧残、秩序的破坏以及心理的重创都惊人的相似。大瘟疫造成的刻骨铭心的无常感和恐惧感，曾经是宗教流行的社会心理条件。宗教不仅为瘟疫中的人们提供意义，将这种苦难和不确定性合理化，而且还通过各种禁忌规定、互助-慈善的行动和制度等，为降低瘟疫的破坏性后果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和具体方法。因此，尽管宗教的集聚活动事实上也是瘟疫扩散的重要肇因，但是，总体上，当科学与世俗力量没有在认知与行动上有实质性突破之前，在人类抵抗瘟疫的漫长而痛苦的历史中，宗教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支持、庇护和激励作用。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病毒学和医学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卫生、防疫-疾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宗教在这方面的直接作用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统一战线视角下农村基督教治理问题研究”(20ZDA026)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世界宗教热点及宗教舆情研究”的前期成果。

越来越不突出，应对突发性、大规模流行传染病更是世俗国家与医疗卫生体系的责任和专属领域。从本次新冠疫情中宗教的表现来看，大多数宗教团体都能够服从与配合本国政府与专业机构的疫情防控举措，不惜改变延袭已久的传统，服从抗疫大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聚集导致的疫情扩散事件也被凸显出来，对宗教的形象造成冲击，并促发后疫情时代宗教将如何重塑其公共性的问题。

一、瘟疫史中的宗教：兴起、功能与世俗化

人类对抗瘟疫的历史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细菌的发现才露出曙光，其后又经百余年实践和探索，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才“真正地全球化”。^①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在杀伤力巨大的瘟疫中基本处于被动守势。宗教在这个阶段是活跃积极的力量，同时自身也受到瘟疫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具体宗教有着迥异的结果，有些借助瘟疫而获得优势地位或实现“复兴”，有些则受到致命打击。大体上，大瘟疫与宗教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瘟疫在某些世界性宗教确立其地位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次，宗教是人类社会预防和抗击瘟疫的重要资源和依托；第三，随着现代科学尤其是医学的进展，以及现代防疫卫生体系的建立，宗教逐步淡出这个领域。

东、西方几个世界性宗教从弱小的教派或民间信仰之一，演变成所在社会中的主导性宗教，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中，瘟疫，在这些世界性宗教的崛起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公元2世纪中后期至3世纪，东、西方不约而同爆发的大瘟疫，促进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流行与巩固。疫病史和社会史对此提供了新的角度，在传统宗教史强调教义思想竞争、政治军事博弈等因素之外，挖掘了瘟疫导致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巨变等以往被忽略的因素，并将之提升到十分关键的位置。

罗马帝国晚期两次著名的大瘟疫对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公元165年爆发的“安东尼瘟疫”，是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率军镇压叛乱时，由军队带回的天花病毒所致。基督徒被当作是瘟疫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等一系列不幸的惹事者，罗马帝国时期针对基督教的第四次规模较大的迫害由此而产生。公元250年，罗马再次爆发“西普里安瘟疫”（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对之作较详细的记载而得名）。这场瘟疫遍及西方世界所有已知国家，并持续了15年之久，其破坏之大导致当时人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在此次瘟疫爆发前不久，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249-251年在位）就已经发起了针对基督教的严厉镇压。而瘟疫流行期间，先后在位的伽卢斯（Gallus，251-253年在位）、瓦莱里安（Valerianus，253-260年在位）两任皇帝又延续着打击基督教的政策。直到疫情后期的260年开始，局势才有所缓和。基督教在度过随后40年相对平静期后，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皇帝于303年发起罗马时代最后一次针对基督教的大规模镇压。10年后的313年，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us）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②

以上简要的勾勒可以看到，基督教在合法化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多数时候是被打击的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引发瘟疫的罪魁祸首。这些打击既快又猛，导致基督徒大量死亡、流放，财产大量被没收，很多人甚至主动放弃了信仰，连一些主教也不例外。但正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基督教却保持着更加迅猛的发展速度，最终战胜罗马世界存在已久的各种“异教”而成为主导性的宗教。

^① [美]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234页。

^② [德] 毕尔麦尔等编著，[奥] 雷立柏译《古代教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9-59页。

教会自身的神学解释自然会放在“上帝的大能”与“恩典”上，将这段史实作为基督教真理的见证。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什么神秘之处。

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论证说，如果罗马没有被瘟疫等灾祸弄得“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基督教可能从来不会一跃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① 斯达克提出的三个关键证据，第一个属于宗教的基本功能，即意义之提供。在瘟疫中，“异教与希腊哲学拥有的解释事物和宽慰人心的能力统统宣告无效。”而基督教则提供了让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些可怕的事情会降临。不过，仅凭此尚不足以支撑基督教的最终胜利，另外两个具有关联性的社会学因素，为基督教在意义竞争中获全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一是基督教的爱的教义与价值观，在瘟疫流行时落实在关爱、服务与互助行为上，相对降低了基督徒自身的死亡率，提升了基督徒群体的存活率，这在瘟疫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恐怖氛围中，无疑是个“神迹”，这种“神迹”既巩固了基督徒自身信仰的坚定性，又增强了对异教徒的吸引力；第二个因素更为关键，即瘟疫导致人口锐减，破坏了原有的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会网络，传统道德秩序不复存在，这使得基督教的扩张不再受原有“异教徒”关系网络的束缚和阻碍。

佛、道教在中国的兴起亦与疫疾大流行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统计，中国历史上大疫流行有两个活跃期，即2-3世纪和16-19世纪。^② 前一个活跃期是两汉魏晋时期，正是在此期间，佛、道教在中国成形并奠定其优势地位。据统计，在两汉期间的52次疫灾中，东汉占了37次，且主要集中在桓、灵、献时期。桓帝时期的疫灾最为频繁，21年里共有6次，平均3.5年有1次疫灾；其次是灵帝时期，平均3.7年1次疫灾。^③ 三国时期（220-264年）有9年共发生疫灾10次，平均4.5年一次，两晋时期则有34个疫年共发生疫灾40次。尽管这个时期战争与其它天灾人祸也造成重大破坏，但瘟疫期间那种“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的恐怖，对社会心理的冲击显然是极为强烈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汉桓帝刘志（132-167年）已在宫中“数祀浮图、老子”，作为有史可载的第一位敬拜佛、道的皇帝，其任内瘟疫最为频繁，这显然不是巧合。尽管汉末魏晋佛教在民间的流传情况仍然比较模糊，但从考古发现可证得当时民众对佛教已有相当了解并多有供奉。相对而言，道教的创立与这一时期的瘟疫流行则有着十分清晰的关联。无论是张陵的五斗米道还是张角兄弟的太平道，以符咒为人治病都是其传教的主要手段，利用瘟疫造成的末世恐慌而迅速扩张。特别是五斗米道还针对当时社会疫疾流行、但祷祀无效的情况，吸取巫术中的禁咒、厌胜，摈弃了祭祀，被认为是道教创立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④

除了世界宗教在早期确立优势地位凭籍瘟疫流行外，宗教的扩张以及新宗教的产生很多也与瘟疫有关。最著名的就是基督教在美洲的扩张。墨西哥与秘鲁古老宗教消失得如此彻底，土著民对长久庇佑他们的神祇和祭典不再虔诚，很大程度上是欧洲输入传染病导致这个地区政治文化全面崩溃，强烈冲击当地人的信仰与信心，最终导致大规模皈依。而中国的“三一教”在16世纪中期从学术团体向宗教团体演化，也明确地同嘉靖年间福建的瘟疫有关。^⑤

在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中，宗教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宗教中不仅存在大量来自瘟疫经

① [美] 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② 张美莉、刘继宪、焦培民《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③ 焦培民、刘春雨、贺子新《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第95-97页。

④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⑤ 赵献海《瘟疫与民间宗教——以林兆恩与三一教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

验的戒律、禁忌，持续帮助人们防疫治疫，从而“有助于把人类社会隔离于疫病的传染链之外”^①；而且，宗教也发展出各自的理论试图解释瘟疫的来历与作用机理，有些宗教在自身对瘟疫的这种认知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药物与保健预防措施。如道教的医药类文献中都有对瘟疫的专门论述和药物药方，道教的很多术法、仪式都与防治瘟疫有关，道教养生理论也有相当多与瘟疫防治相关的内容。^② 佛教虽然强调治心，但也重视治人的身病，佛教徒在弘法的同时也始终将济医度药作为普发慈悲心、广度众生的方便，尤其是在古代社会瘟疫肆虐时，僧人更是积极为民众提供实质性的救助，从物质与心理上缓解人民的痛苦。还有象中东穆斯林学者在黑死病蔓延至这个地区时，撰写了大量律法性质的著作，根据敬虔传统来解释这种疾病，指导信徒在瘟疫期间的正确行为，并提供一些外围性的医学建议。^③ 总之，宗教为瘟疫中的民众提供各种帮助的同时，也巩固了信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开启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天主教大量教士死于瘟疫中，导致教职人员奇缺；而民众的高死亡率对葬礼的需求急剧增长，同时，瘟疫造成的社会心理冲击也需要教会的专业抚慰。这就使得供需关系处于极大的不平衡中。于是，一方面，教会提供宗教服务的收费标准大幅度提高，滋生腐败；另一方面，为了填补空缺，不得不降低标准培育、任命神父及其它教职人员，很多神父甚至是不识字的文盲。因此，尽管黑死病短期内加强了人们对基督教的虔诚，但同时又增加了社会上对教会的不满，导致大量反社会、反教会、反权威行为。特别是“教会无法取悦上帝和平息瘟疫而产生的失望和沮丧”^④更使教会权威尽失。黑死病最终促使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早期现代社会，也打开了宗教世俗化的大门。

纵观宗教在人类瘟疫史中的表现，可以发现，瘟疫促进了宗教的兴起和流行，宗教也在瘟疫中发挥着抚慰人心、救死扶伤、灾后重建等重要功能。当然，即使在宗教可以发挥“正功能”的时代，宗教的聚集也是瘟疫扩散的重要原因。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认为，宗教朝圣在引发疫病中扮演的角色可与战争比肩；而且，疾病来自上帝的信念可以轻易地转换为，若采取措施有意识地预防疾病，无异于干预神的意志，这是不虔诚的表现；所以，“与保护人类免遭疫病的习惯和信仰相配的是另外一些引发和招致疫病的习惯和信仰。”^⑤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医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在认知与行动两方面获得主导，宗教在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行动力不断收缩，这也是一般世俗化理论所揭示的进程。就本次新冠疫情而言，从世界范围看，宗教的表现既有亮点，亦有令人遗憾之处。宗教应对瘟疫的“正功能”被规范的医学和防疫体系所替代的同时，其“负功能”反而在信息时代被轻易捕捉甚至放大。这实际上意味着提供了一个宗教自身反思的机会。

二、新冠疫情期间五大危及公共安全的宗教聚集事件

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宗教界大多能够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不仅体现了宗教传统中爱与悲悯的内核，也体现了现代宗教理性、文明的一

① [美] 威廉·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第191页。

② 盖建民、彭必生 《道教医学对瘟疫防治的历史贡献》，《中国宗教》2020年第3期。

③ Michael W. Dols, The Second Plague Pandemic and Its Recurr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1347-1894.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79, Vol. (22), pp. 162-189.

④ [美] 约瑟夫·P·伯恩 《黑死病》，王晨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1页。

⑤ [美] 威廉·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第192页。

面，将敬虔、谦逊与尊重科学、博爱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比较突出的如中国的宗教界迅速遵照党和政府的统一部署，严格落实“双暂停一延迟”（即暂停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暂停一切集体宗教活动，宗教院校延迟开学）措施，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宣传引导与心理疏导，全力维护宗教领域稳定；同时，中国宗教界亦发挥宗教自身优势，依法有序开展慈善捐助活动，向海外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汇聚防疫抗疫强大力量，为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积极贡献。^①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各国相继爆发疫情，无论对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如何，也不管防控措施的严厉程度和推行能力如何，各国政府都采取了限制公共集会、推行居家隔离、鼓励保持人际距离等举措。各主要宗教大多能够支持、配合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关闭宗教的活动场所，暂停各类宗教服务，以避免信众大量聚集而造成病毒扩散。这对宗教而言，实属改变了沿袭千年的传统，这些传统中有些具有仪式性质甚至重大神学意义。尽管不少宗教团体都利用互联网开展“虚拟崇拜”，提供远程宗教服务，但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社会运行—经济活动的“停摆”，同样对宗教冲击巨大。

例如，由于处于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梵蒂冈宣布与意大利政府的各项防疫政策保持一致，要求信徒在圣彼得广场保持人际距离，取消包括天主教教理课程、婚前准备课程、静修会、朝圣等非圣礼性质的集体活动，并将这一规定先后两次延长，直至5月3日。沙特阿拉伯则暂停穆斯林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签证，并关闭了清真寺。阿联酋、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等国也都关闭了清真寺，鼓励信徒“在家祈祷”。伊拉克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坦尼（Grand Ayatollah Ali Sistani）表示，穆斯林必须避免身体接触；那些怀疑自己被感染或表现出症状的人不应与人混在一起。^②甚至连巴勒斯坦也关闭了对其旅游业和对基督教都至关重要的圣城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③ 欧美各国的宗教大部分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是，也有一些宗教团体不理睬相关的禁令，仍然不顾一切地举办集体宗教活动，导致疫情的扩散，或是增加了扩散的风险。毫无疑问，这些团体的鲁莽行为并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被斥责为“令人费解的不负责任行为”^④ 其负面形象在当前网络世界里更被放大。与其它“非宗教”性的人群聚集相比，疫情期间的宗教聚集更容易激起人们的紧张和反感，以致于宗教的各种活动场所——清真寺、教堂、寺庙和神殿——“成为政府遏制全球致命病毒传播的前线。”^⑤ 综合各国的报导，这些事件主要有：

1. 韩国基督教异端“新天地”教会事件^⑥

韩国基督教异端团体“新天地教会”在韩国城市大邱的聚集感染事件，是疫情期间引

① 《五教同行 共战疫情 全国宗教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综述》，《中国宗教》2020年第3期。

② Nabih Buloss, 25/3/2020, Private prayers and empty funerals: the pandemic is hard on the middle east faithful.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25/pandemic-is-hard-on-middle-east-faithful>.

③ Associated Press, 5/3/2020, Bethlehem's Storied Nativity Church Closes Amid Virus Fears, <https://www.voanews.com/science-health/coronavirus-outbreak/bethlehems-storied-nativity-church-closes-amid-virus-fears>.

④ Peter Bergen, 7/4/2020: Religious gatherings around the globe inflame the virus. <https://edition.cnn.com/2020/04/06/opinions/religious-gatherings-coronavirus-bergen/index.html>.

⑤ Nabih Buloss, 25/3/2020, Private prayers and empty funerals: the pandemic is hard on the middle east faithful.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25/pandemic-is-hard-on-middle-east-faithful>.

⑥ 新京报记者：祖一飞 2/3/2020：韩国反邪教人士：疫情扩散下的“新天地”教会。 <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20/03/02/697723.html>；上观新闻作者：宗赫 2020-03-02，9000 信徒出现症状，确诊超 2000 例！韩国“新天地”会长跪地谢罪， <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218918>；澎湃新闻记者，刘栋，5/3/2020，危险的控制：起底韩国疫情风暴眼新天地教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322381。

爆舆论的第一个与宗教相关的事件，也是实质性造成较严重感染后果的事件，海内外媒体有较多报导。这个宗教团体的“异端”性质及其在事发后各种掩盖、卸责闹剧，与地方政府的冲突，最终教主出面下跪道歉、国家予以法律制裁，整个事件沸沸扬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韩国在1月20日确诊首例新冠感染者，在其后将近一个月里共确诊30例，原本防控形势良好。直到2月18日确诊了第31名感染者，才发现这位61岁的妇女，在2月7日就已经出现发冷、喉咙痛等症状，并在大邱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入院后的2月9日和16日，她不顾医护人员劝阻，两次离开医院参加大邱“新天地”教会活动。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调查，“31号”病人参加的两次聚会合计有1001人参加，直接感染37人，其他还有至少600例感染者与“新天地”教会相关。作为一名“超级传播者”，她在医院就诊时还造成了“院内感染”。在这名患者确诊后，韩国感染者确诊数急剧上升。感染数从1增长到1000，用了30多天；而从1000增长到4000，只用了短短4天。

引发民众的恐慌与愤怒的是，即使发现有信徒感染，“新天地”教会仍多次组织聚会活动，每次聚会都禁止戴口罩，认为那是对神的不敬。同时，其特有的聚会方式是人挤人跪在一起，根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表达对神以及教主的服从和虔诚，信徒生病也不被允许缺席聚会。教主李万熙在2月21日以必读公告的形式给信徒们发送了一封特别信件，称这次疫情事件是“魔鬼的行为”，“是恶魔看到新天地的迅速成长，为了阻止它而引起的。”

为了控制疫情，查清感染扩散线索，韩国政府决定对所有“新天地”成员进行病毒检测，并强制关闭“新天地”教会的活动场所。尽管“新天地”教会同意向政府提供全部教徒名单和联络方式，但对名单作了篡改，隐瞒了相当数量的信徒。有鉴于此，2月25日，首尔警方对“新天地”总部突击搜查，强行进入并没收了人员名单。韩国各地地方政府也都对其信徒全面排查。3月1日，首尔市以过失杀人罪、伤害罪、违反传染病预防管理相关法律等罪名，对“新天地”教主李万熙等人提起诉讼。3月2日下午，89岁的韩国“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召开记者会，行大礼道歉，表示尽管并非本意，但出现这么多感染者，自己毫无颜面，向国民真心道歉。

2. 法国“基督教开门教会事件”^①

几乎与韩国“新天地教会”事件同时，法国也发生了因为教会聚集而导致的疫情扩散。2月17日至21日，法国东部与德国和瑞士接壤的10万人小城市穆豪斯（Mulhouse）的一家名为“基督教开门教会”（Christian Open Door）的福音派教会，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祷告与禁食聚会”。这家教会是1966年由牧师塞缪尔·彼得施密特（Samuel Peterschmitt）同他父亲创立的，其现在使用的教堂由超市改造而来。在过去的25年里，它每年举行“祈祷和禁食”聚会。今年的聚会有超过2500名信徒聚集在一起祈祷、唱歌和舞蹈，他们相互拥抱、牵手。聚会过后的三天，牧师彼得施密特就发烧了，最后他连同自己的6个子女并13个孙辈，都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

聚会过后大约一周，2月29日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有一个居民被确诊感染，但她并没有参加“基督教开门教会”的聚会，所以当地卫生部门没有把线索追踪到该教会，

^① Lara Marlowe, 1/4/2020, How five days of evangelical worship set of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France.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how-five-days-of-evangelical-worship-set-off-the-coronavirus-outbreak-in-france-1.4217239> Tangi Salaün, 30/3/2020, Special Report: Five days of worship that set a virus time bomb in France.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france-church-spec/special-report-five-days-of-worship-that-set-a-virus-time-bomb-in-france-idUSKBN21H0Q2>.

后来才得知是她的两个孩子同他们的祖父母参加了那次聚会。3月2日，尼姆斯（Nîmes）的一个独居市民从穆豪斯开车回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地卫生部门才意识到可能与“基督教开门教会”有关。

法国卫生部门最后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该教会是法国疫情的“引爆点”。而病毒已经被参加聚会活动的信徒们全面扩散，法国多个城市如巴黎、奥尔良、贝桑松、圣洛等地的疫情爆发都与“开门教会”的崇拜活动有关。甚至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地中海岛屿科西嘉岛、拉丁美洲的圭亚那，以及瑞士、法国的核电站都被参与该教会活动的信徒带去了病毒。这个教会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传染病区域集群之一，使病毒迅速蔓延全国，最终蔓延到海外。

3. 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事件^①

法国的疫情扩散主要是某个单一教会机构造成的，而以色列的犹太教极端教派则以城市和社区规模给防疫造成压力。疫情爆发后，以色列全国实施了居家令以遏制疫情的蔓延，但是，某些地区的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却无视相关规定，照旧进行宗教聚会，导致疫情扩散。例如，4月3日，以色列警方包围了一个极端正统派居多数的小城 Bnei Brak，设置路障限制居民出入。原因即城中的极端正统派居民不遵守政府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根据以色列卫生部门统计，4月初在该市不到20万的人口中，登记了1061个确诊病例，仅比耶路撒冷的1132个确诊病例略少，而后者的人口则是该市的四倍还多。该市医院院长估计，由于极端正统派居民占多数，所以该市的疫情传染速度是其他城市的4-8倍。

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对礼拜、教义研习以及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如葬礼和婚礼等，都极为重视，因此对政府所要求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政令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特别是4月8日开始的犹太教逾越节，传统上必须同家人、朋友一起庆祝。以色列政府呼吁民众只与同住的家人一起过节，但极端正统派完全无视政府建议，照旧过节。在稍早些时候，3月9日的普瑞姆节（holiday of Purim），各地极端正统派也照过不误。一周后，耶路撒冷附近的极端正统派村庄 Kiryat Yearim，其7000名居民中就有约四分之一被隔离。警方亦突击进入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 Mea Shearim 社区，关闭会堂并开具罚款。

极端正统派社群中疫情的快速扩散，固然与其居住条件拥挤、重视大家庭共同生活和集体庆典等原因有关，但更多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如对国家权威的严重不信任、宗教领袖对健康风险的无知、对以社区活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狂热投入等；特别是极端正统派的一些拉比中，有许多人厌恶当今时代的世俗化影响，强调祈祷和妥拉（Torah）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信仰“将把我们在这种病毒中拯救出来”。很多极端正统派民众被教导说，这次新冠疫情的流行，充其量就如同战争时期甚至“大屠杀”那样，能够加速“弥赛亚”的到来，“让我们更接近救赎”。极端正统派的这种观点及其在疫情中的表现，加剧了以色列世俗社会同极端正统派的紧张关系。

^① David M. Halbfinger, 30/3/2020, virus Soars Among Ultra-Orthodox Jews as Many Flout Israel's Rul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0/world/middleeast/coronavirus-israel-cases-orthodox.html>; Paul Goldman and Saphora Smith, 3/4/2020, Israel locks down ultra-orthodox city hit hard by coronavirus,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israel-locks-down-ultra-orthodox-city-hit-hard-coronavirus-n1175736>.

4. 东正教圣餐礼仪争议事件^①

东正教社会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具有神学意义的具体仪式上。疫情爆发后，希腊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剧院和大型公共集会，并配合其它措施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三月初有居民从以色列和埃及朝圣归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3月12日出现第一起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案例，这是一位66岁的帕特拉斯人，他在前往圣地和西奈山的途中染病。为此，希腊政府提高了疫疾防控的级别。由于东正教在希腊势力强大，因此，教会的支持直接影响防疫的成效。教会最初强硬表示不会停止在教堂的各种活动，但是，最终经过协商，希腊东正教圣协会（Holy Synod）在3月16日同意无限期暂停所有日常宗教服务和圣礼，作为政府遏制新冠病毒的努力之一部分。各教堂只开放私人祈祷，停止集体性、公共性的婚礼和洗礼，葬礼只在亲密的家庭圈子里举办。在此前，希腊东正教会虽然同意配合政府防疫，但拒绝关闭教堂和主日聚会。在严峻的疫情面前，教会不得不作出让步。

虽然希腊在欧洲各国中，属于疫情防控较有成效的国家，但民众普遍认为，这个成功并不归功于东正教强硬派及其神职人员，他们以神学和传统为理由的若干公开声明和做法，事实上削弱了希腊政府在3月份的头几个关键星期里应对疫情的努力。这种信仰及其实践同世俗政府疫情防控举措的紧张关系，正在整个东正教世界上演，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黑山等都遇到类似的问题。拥有世界将近一半东正教信徒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东正教会则明确宣布不会关闭教堂和停止宗教服务，只是提出若干措施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对圣像和十字架消毒，建议信徒暂时避免触摸和亲吻圣物等等，希望以此来保护信众不受感染，防止教会的聚集成为病毒扩散源。

在东正教世界中引发巨大争议的焦点，是“圣餐礼拜是否应该共用一把勺子”这样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圣餐礼拜时用什么方式在信众中分发葡萄酒（或汁）和无酵饼，在基督宗教的

① Anthee Carassava, 9/3/2020, Coronavirus Sparks Church-State Controversy in Greece. <https://www.voanews.com/science-health/coronavirus-outbreak/coronavirus-sparks-church-state-controversy-greece>. Sam Cucchiara, 25/3/2020, Greek Orthodox Suspends Masses following communion chalice refusal. <https://9now.nine.com.au/a-current-affair/coronavirus-greek-orthodox-and-other-churches-suspend-public-masses/f2932e69-894e-4e89-b8ac-d2a1cf68d501>. 16/3/2020, Greek Orthodox Church agrees to suspend daily services, sacraments over coronavirus, <https://www.ekathimerini.com/250716/article/ekathimerini/news/greek-orthodox-church-agrees-to-suspend-daily-services-sacraments-over-coronavirus> Ron Synovitz, 17/3/2020, Coronavirus Vs. The Church: Orthodox Traditionalists Stand Behind The Holy Spoon. <https://www.rferl.org/a/coronavirus-vs-the-church-orthodox-traditionalists-stand-behind-the-holy-spoon/30492749.html> Reuters, 10/3/2020, In era of coronavirus, Greek church says Holy Communion will carry o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greece-church/in-era-of-coronavirus-greek-church-says-holy-communion-will-carry-on-idUSKBN20W2N1> Caleb Parke, Greek Orthodox church under fire for sharing communion cup, spoon among congregants amid pandemic. <https://www.foxnews.com/world/coronavirus-update-church-communion-cup-spoon-australia> Katie Griffin, 16/4/2020, Ottawa's Greek community is mourning the death of a popular chanter from COVID-19. <https://ottawa.ctvnews.ca/ottawa-s-greek-community-is-mourning-the-death-of-a-popular-chanter-from-covid-19-1.4899746> Anthee Carassava, 28/4/2020, Greek Church Demands Government Ease Controls on Religious Services. <https://www.voanews.com/covid-19-pandemic/greek-church-demands-government-ease-controls-religious-services> 19/4/2020, Coronavirus: Orthodox Easter weekend marked under lockdow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2339183> Joanna Tzouvelis, 12/4/2020, Greek Orthodox church feels financial affects of coronavirus. <https://rosindale.wickedlocal.com/news/20200410/greek-orthodox-church-feels-financial-affects-of-coronavirus> Yannis-Orestis Papadimitriou, 24/3/2020, Blood, Wine and the Coronavirus. <https://newhumanist.org.uk/articles/5592/blood-wine-and-the-coronavirus> Yiannis Baboulias 27/4/2020, Communion and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Triggers Deep Orthodox Divisions.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0/04/27/communion-and-the-coronavirus-covid-19-triggers-deep-orthodox-divisions/>.

各个派别中各有不同，并且有各自神圣的解释。东正教的传统是用圣餐勺把泡在葡萄酒中的面包送到信徒嘴里。是否用圣餐勺曾经是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使用圣餐勺在7世纪就成为拜占庭的习俗，并在11世纪被东正教所普遍接受。此次疫情将这个问题重新凸显出来，医务人员认为，信众共用一把圣餐勺显然会通过唾液传播病毒。

为此，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则早在2月28日就宣布针对新冠病毒要采取“特殊措施”，建议礼拜者使用自己的勺子来接受圣餐，而不是按照习俗“分享”圣餐勺。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建议信众自带一次性餐勺。但是，很多教会并没有采纳这种权宜做法。一段视频显示，直到3月15日，在喀山的一个东正教堂里，信众仍然在弥撒时直接从一把公用的圣餐勺里接受圣餐。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拒绝自带餐勺建议的理由是，共用的圣餐勺浸在葡萄酒中，因此足够杀死病毒。这个解释是从科学而不是信仰的角度立论的，但并不被医学界接受，因为葡萄酒的酒精度只有约12%，不足以杀灭病毒。

而希腊的东正教会则从神学角度坚持共同圣餐勺的传统，教会发布声明称，圣餐绝对不可能传播疾病，因为酒和面包代表基督的宝血和肉，是没有瑕疵的。“参加圣餐的信众正在接近上帝，上帝有治愈的能力。”一位希腊东正教神父告诉记者，他称圣餐是一种“爱的行为”，可以战胜恐惧。保加利亚东正教也向其信徒保证，不可能因饮用圣酒而感染冠状病毒。

这场“圣勺之争”也蔓延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超过37万人信仰东正教，在疫情扩散的早期，澳大利亚东正教会就因在圣餐礼拜时继续使用同杯同勺而受到批评，被认为不符合卫生要求，尤其在疫情期间具有潜在风险。但是，信徒认为只要有信仰和爱，就不怕与罹患新冠肺炎的人共享圣杯圣勺。澳大利亚东正教的大主教马卡里奥斯（Makarios）在给他的信徒的信中写道：“我以负责任的态度向每一位信徒保证，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到目前为止，从未发生过通过圣餐传播传染病的事件。”不过，随着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相关命令，澳大利亚东正教会也不得不宣布暂停所有公共弥撒，但仍然否认共用圣勺的危险。

这些国家的医师和普通民众纷纷表达了对东正教这个传统的不满。如希腊住院医师工会（Federation of Hospital Doctor Unions in Greece）强调，共用圣勺可以使病毒通过唾液传播，因此“很怀疑他们的信仰能够提供他们所相信的保护。”保加利亚民众批评本国东正教会的这种做法，在Facebook上称之为“中世纪的痴呆症。”而拥有80多个大型东正教教区、40多万东正教信徒的德国政府，则干脆强制干预，明令禁止东正教教会在疫情期间以传统的共用圣勺的方式举行圣餐礼。

5. 印度伊斯兰教“泰卜里厄·哲玛提”团体聚集感染事件^①

印度伊斯兰教“泰卜里厄·哲玛提”宣教团体（Tablighi Jamaat，以下简称TJ，中文称“达

① Ritika Jain, 21/4/2020, Covid - 19: How fake news and Modi government messaging fuelled India's latest spiral of Islamophobia: A timeline of events from March 29 to April 14. <https://scroll.in/article/959806/covid-19-how-fake-news-and-modi-government-messaging-fuelled-indias-latest-spiral-of-islamophobia>. Asim Ali, 1/4/2020, Coronavirus was a test of secular nationalism. Then Tablighi Jamaat became the scapegoat. <https://theprint.in/opinion/coronavirus-test-of-secular-nationalism-tablighi-jamaat-became-scapegoat/392764/>. Ambreen Agha, 9/5/2020, Is Tablighi Jamaat a Variant of Islam? <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opinion-is-tablighi-jamaat-a-variant-of-islam/352385> Amitabh Sinha, 14/4/2020, Communist - Islamist Bioterrorism Merits Befitting Response. <https://www.sirfnews.com/communist-islamist-bioterrorism-merits-befitting-response/> Press Trust of India, 16/5/2020, 1,640 foreign Tablighi Jamaat members were in India, only 66 contracted COVID - 19: Jamiat. <https://thekashmirimages.com/2020/05/16/1640-foreign-tablighi-jamaat-members-were-in-india-only-66-contracted-covid-19-jamiat/> Abhinav Pandya & Sam Westrop, 2/5/2020, How did India overlook Tablighi, World's largest radical organization? <https://www.sundayguardianlive.com/news/india-overlook-tablighi-worlds-largest-radical-organization> Mohd Ayub, 12/4/2020, Tablighi Jamaat and the Precar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https://www.recordnepal.com/covid19/tablighi-jamaat-and-the-precarity-of-global-governance/>.

瓦宣教团”)引发的疫情扩散,在印度国内引发了更大的动荡,并且同印度的宗教与民族之争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

2020年3月13日至15日,印度TJ在其总部所在地——新德里尼扎穆丁地区的马卡兹(Markaz in Nizamuddin)举行年度集会(ijtema),共有约250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47个国家的多达1,640名外国TJ成员。其后不久,参与者中据报导有超过400人因新冠肺炎住院;严重的是,更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及信徒去向不明,有可能将病毒扩散印度各地。根据四月上旬的感染数统计,印度3万多病例中有上千例与TJ的此次聚会有关。如北方邦(Uttar Pradesh)、中央邦(Madhya Pradesh)都报告说,当地新冠感染者大多是参加完TJ聚会后从新德里返乡的穆斯林。印度卫生部表示,这次TJ集会使得印度的“病例加倍率”从估计的7.4天缩短到4.1天。

为此,新德里警方关闭了TJ位于新德里的总部,并对其负责人Muhammad Saad Kandhlawi以及其他6名高级成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违反了一系列旨在遏制新冠疫情的政府法令。而TJ方面则辩解说,年度聚会是其传统,且在疫情爆发前一年即已安排筹划,政府对疫情反应迟缓才是导致感染数爆涨的原因,并指责印度卫生部在13日仍然误导性地声称新冠病毒并不导致健康紧急状态,这就使TJ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继续集会;而“封城令”又事发突然,导致来参加聚会的近千名国外信徒滞留在TJ提供的拥挤宿舍中,增加了交叉感染风险,TJ声称已多次向政府请求疏散这批人员而未果。总之,TJ认为是政府对疫情的迟疑和混乱的处置,使自己与广大民众一起处于危险的境况中。

印度官员则反击说,新德里政府3月13日已颁布禁令,禁止200人以上聚会;此前一天则规定有过疫区旅行史的任何人均需自我隔离,因此TJ是明知故犯,不仅不停止聚会,而且也没有隔离来自国外的参加者。德里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Zafarul Islam Khan指出,在新冠疫情日益严重、政府呼吁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TJ仍然组织大规模宗教集会“错误和麻木不仁的”;当然,他强调绝不能借机指责所有穆斯林传播病毒。

实际上,印度其它宗教的集会活动,也在TJ集会的几乎同一时期进行,这些都可能成为病毒扩散的温床。如印度教的很多寺庙在当时仍然对成千上万信徒开放。旁遮普邦70岁的锡克教教士巴尔德夫·辛格,3月初经意大利和德国返回,违反居家令参加了当地锡克教的Holla Mohalla节,3月18日因病去世,死后检验出新冠病毒阳性,导致邻近多个村庄被封闭隔离,4万余人受影响。在旁遮普邦最初的33起新冠肺炎病例中,有32例与辛格有关,他因此被称为印度的“超级传播者”。但这些宗教并没有象TJ那样处于风暴中。

一些专家认为,印度新冠感染数量的早期统计中,有相当比例来自TJ聚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偏差”;也就是说,由于印度新冠病毒检测并没有全面展开,大量感染者尤其是无症状者并没有被检测到,而参与TJ活动的人相对集中,容易被追踪检测,所以造成与之相关的感染者比例较高。但是,尽管如此,印度一些政客和团体,在TJ聚会后的将近一个月里,掀起一场针对TJ的舆论攻击,将之描绘成新冠肺炎的“超级载体”,渲染TJ“故意”传播病毒,试图以此妖魔化整个穆斯林群体。

如印度“共和国电视台”著名主播阿诺巴·葛斯沃米(Arnab Goswami)将TJ聚会描述为“穆斯林的阴谋”,是故意“散布对封城措施的仇恨”;还有记者抨击TJ“单枪匹马地破坏了印度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而教派意识浓厚、强调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人民党”更趁机向TJ和穆斯林猛烈开火,人民党内不少精英和高层人物在各种媒体上批评TJ的宗教集会是“错误行动”,“导致巨大的灾难”,是“犯罪性质的疏忽”;更有甚者把TJ集会导致病毒扩散称作“伊斯兰叛乱”(Islamic Insurrection),是“一桩塔利班罪行”,在推特上鼓吹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处置参与TJ集会的穆斯林。各种自媒体上更是充斥着诸如“冠状圣战”(Corona Jihad)、“冠状恐怖主义”(Corona Terrorism)等将新冠病毒与伊斯兰群体联系起来的用语。此

外，还有各种移花接木的假视频、假照片推波助澜。

4月19日，印度总理莫迪首次就此发表意见，他在推特上写道“新冠病毒不分种族、宗教、肤色、种姓、信仰、语言或边界”，呼吁“团结和兄弟情谊”以共同对抗新冠病毒。

对TJ的攻击，一方面是这次聚会的时间点极为敏感，当时印度公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和对政府应对不力的愤怒正在积蓄，在这当口，TJ适时出现，堵枪眼般做了“出气阀”。不过，在当时其它宗教也没有停止各种宗教性聚会，为什么只有原本极为低调的TJ成为众矢之的？这涉及另一方面的矛盾，即印度国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自2014年上台以来，对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一直有意无意漠视甚至暗中挑唆。人民党向来毫不掩饰基于印度教认同而建立统一国家的主张，因此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宗教教派”倾向的政党，与世俗化的国大党相比，其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人民党不断将印度穆斯林作为假想敌，特别是2019年12月印度议会冬季会议通过公民修正法案，将穆斯林排除在权利之外，引发骚乱，这场冲突在疫情前刚刚勉强平息。而在抗疫问题上，印度政府的迟疑与低效也使民怨郁积。TJ聚会事件犹如天赐，一下子把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个神秘组织身上，并进而扩展到整个穆斯林群体，大大减轻了莫迪政府的压力，一些观察者辛辣地指出“炒作马卡兹（Markaz）问题是转移政府责任的策略。”

事实上，TJ的年度聚会不仅在印度造成了大量感染，而且在南亚其它几个国家也造成后果。如2月27日至3月1日，TJ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外的集会有1.6万人参与，导致马来西亚和其它国家有2000余人感染新冠病毒。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来自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的穆斯林。到3月中旬统计，文莱、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均有与此次集会相关的人员被确诊新冠感染。3月TJ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Lahore）的聚会也导致两万多人被隔离。

以上是疫情期间，宗教领域引起舆论较大关注的几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事件，如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全光勋牧师强行在首尔光化门集会，并妄称基督徒就是要追求死亡，不惧病毒。2月24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还有如巴基斯坦卡拉奇政府下令停止该市清真寺周五主麻祈祷，导致信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美国弗吉尼亚切斯特菲尔德市的“新拯救福音教会”（New Deliverance Evangelistic Church）创始人杰拉德·格伦（Gerald Glenn）牧师，在3月22日不顾防疫禁令举行礼拜，声称“我坚信上帝比这种可怕的病毒更强大”，其后被检测出感染病毒，4月12日病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生命会幕教会”（Life Tabernacle Church）牧师托尼·斯佩尔（Tony Spell）不顾居家令而举行礼拜聚会，3月31日被警方逮捕。教会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普遍同情，甚至其邻居都厌恶地说，“他们只是担心奉献箱中的钱不够”。^①

三、后疫情时代的宗教：重新思考宗教的公共性问题

全球战“疫”仍在继续，其规模与影响已远远超越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世界各国都在面临一场由疫情带来的长远而深刻的改变。经历了新冠肺炎的世界会和之前大不相同，宗教领域亦不可能例外。例如，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变化，就是会有更多的宗教团体或个人，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远程宗教服务，丰富互联网宗教信息交流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这将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潮流，极大地改变宗教的传统形态，对政府的互联网宗教立法与管理形成进一步的挑

^① Carlos Barria, 6/4/2020, Louisiana church holds services, defying coronavirus stay-at-home order.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church/louisiana-church-holds-services-defying-coronavirus-stay-at-home-order-idUSKBN21N0UU>.

战。如果说此前不少宗教机构和信徒还只是将网络当作一种辅助手段，那么，在此次疫情中，少则数月，多则半年，很多宗教团体使用各种互联网工具，向处于居家令和社交距离规则“约束”下的信众提供各类远程宗教服务，不啻于一次“网络宗教”的强化演练，无论是宗教团体、宗教领袖还是宗教信徒，疫情后将更熟悉和热衷于使用互联网技术来巩固、强化、传播和交流信仰。

然而，如果在疫情中暴露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并促成相关共识与行动的话，后疫情时代随着互联网宗教等新的宗教形态进一步更加巩固，不可避免将导致宗教领域更大的混乱，刺激宗教与社会之间更大的张力，最终吞噬包括宗教在内的全社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作的牺牲和努力。

上文所列举的若干宗教团体在疫情中的表现，即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呈现。从表面上看，尽管此次疫情中宗教领域整体比较平静，但仍然出现了一些因宗教的聚集而导致疫疾扩散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些宗教聚集事件都是在涉事宗教团体所在国发出疫疾警告，甚至已颁布防疫规令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宗教本身承载着道德的光环，被期待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因此，尽管更多导致病毒扩散的聚集是在办公楼、商店、餐饮、博物馆、美术馆、健身房等“非宗教”场合发生的，但当同样后果的聚集发生在宗教场所时，引发的社会反应更加强烈。

从这些涉事的宗教团体看，绝大多数是亚伯拉罕系宗教中偏保守的派别，甚至是本宗教中的异端团体（韩国“新天地”教会）。这些团体中，既有极端的基督教福音派，又有犹太教极端正统派，还有伊斯兰教中保守的TJ宣教团，以及整体上偏保守的东正教中更趋极端的强硬派。这些派别虽然分属不同的宗教，有各自的神学教义主张和崇拜、礼仪传统，但其共同特征是，都强调信仰生活高于世俗的社会-政治生活，标榜自身只关注信仰-灵性事务，不涉入世俗的公共事务，然而，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中，也正是这些似乎致力于“私人信仰”的团体，其行为对“公共安全”产生实质或潜在的威胁；在保障所声称的本教信众宗教权益的同时，冲击了更大范围里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因此，这些涉宗教的聚集事件所反映的，并不是传统的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尽管或多或少仍然与这些惯常的张力有关，而是更多涉及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公共性”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某种程度上仍是世俗化-反世俗化问题的回响，但在后疫情时代，它具有了更加急迫的讨论价值。

经典世俗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扩展，宗教将逐步退出公共生活，日益私人化。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得到经验层面一定程度支持的反世俗化论说，认为世俗化理论所预测的宗教“私人化”，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结构趋势。宗教的“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是当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①，宗教在20世纪末正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宗教的符号和话语成为有影响的沟通媒介，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②不过，在上述“反/非世俗化”议题中所揭示并主张的宗教之“去私人化”和“公共化”，实属一种“积极参与式”的公共性，亦即投身政治活动和社会议题论战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对宗教的这种“积极公共性”应谨慎对待。这是由于，宗教既可能促进社会整合也可能是社会分裂的根源；即使在维系“社会信任”这一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方面，不同倾向的宗教团体也有很大差异；^③宗教的积极的公共参与可能引发持续不断的冲突，宗教信

① Casanova, Jose. 1994.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Herbert, David. 2003. *Religion and Civil Society: Rethinking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③ 黄海波 《信任视域下的宗教：兼论基督教中国化》，《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

仰影响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时，它们所引发的大众激情可能会超过最好的民主制度所能控制的程度。^①

那么，宗教是否就必然维持在“私人”状态呢？无数事实表明，如果宗教的私人化局限在私人交往关系与信仰者个体神秘体验中，容易秘密化、神秘化、巫术化，变异为一种仅仅关心自己利益、自我满足的精神关怀和亚生活方式。^② 本次疫情中，所有威胁到公共健康安全的宗教聚集，无一不与标榜私人领域“宗教自由”权、强调与政治—社会问题无涉、宣称只关注信仰的保守宗教派别有关。而事实上，这些团体的貌似与他人无关的“私人”宗教信仰活动，产生了公共性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只要宗教信仰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其活动就必然具有公共性质，无论承认与否，无论意识到与否。这是由“宗教”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任何正常、合法的宗教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性存在，而不是孤绝于社会的地下亚文化，它们都处于内、外部复杂的关系与互动中，这些关系和互动无法完全限制在私人、私密、私域和个体化状态。事实上，公共性问题已成为现代性困境的主要症结之一，而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在此问题上矛盾尤其突出。与宗教相关的“公共性”，在此可以简要地界定为个体信徒以组织化的形式思考、讨论、决定和实行“为大家好”的事情的过程，并由此而带来的“为大家好”的结果；“大家”在此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笼统概念，可以仅仅指涉组织成员，也可以扩展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③ 当前因宗教而起的各种矛盾与张力，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为大家好”的公共利益考量与实践所致。

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宗教之“公共性”，实际上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消极公共性”。宗教信仰者在各自无论是世俗功利还是个体拯救的“私”的动机驱使下参与宗教团体，这些丰富的个人之“私”的联合首先创造了宗教团体的“共同性”；良好的“共同性”尊重个人之“私”的动机、意志和要求，具有“非营利性”和“利他性”，并整合团体所处之更大共同体的价值与规范；在创造良好“共同性”的基础上，宗教团体成为个体信徒由“私”向“公”发展过程中的中间性组织载体或者说具体场所，在不超越道德与法律边界的公共言论与表达领域，以及经由提供公共服务的“支援实践领域”，^④ 宗教团体可以充分实现其公共性。

本次新冠疫情期间，宗教领域出现的若干危及公共安全的聚集事件，为现代社会宗教的公共性问题的迫切性提供了现实的案例。这些案例所折射的“公共性”困境，一是源于环境与制度限制导致的公共性实质匮乏，二是源于因忽视宗教公共性的实质存在而导致公共交往实践的野蛮生长而产生的公共性偏差，三是源于公共性所涉之“公”的内部化或范围狭窄而导致的公共性“俱乐部化”^⑤。这或许是后疫情时代宗教领域需要认真考虑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李文彬)

① Welch, Michael R., et. al. 2007, *The Radius of Trust: Religio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Trust in Strangers*. *Social Forces*. Vol. 86 (1), pp. 23-46.

② 李向平 《私人方式与基督教的社会关怀》，《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2期 《“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5期 《“私人范畴”与“社会产物”——宗教信仰方式与宗教治理法治化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唐文玉 《社会组织公共性：价值、内涵与生长》，《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④ 今田高俊 《从社会学观点看公私问题——支援与公共性》，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刘荣、钱昕怡译 《社会科学中的公私问题》，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61页。

⑤ 李友梅等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